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郭嵩焘



在近代中国，出现过很多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志士仁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是他们的代表，郭嵩焘也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

一、科场少年

郭嵩焘的先祖原籍江西吉安，明代万历年间迁至湖南湘阴。到他的曾祖父时，郭家因为善于经商，已成为湘阴有名的富户。到他的父亲那一代，虽然还经营借贷，但家境已开始衰败，有时穷得全家“不能举餐”。1818年，郭嵩焘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地主家庭里。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汕，晚号玉池老人。因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养知书屋”，所以，又被人称为养知先生。

郭嵩焘从小聪明过人，深得父辈喜爱。加之他又勤奋好学，因此，家里决定不惜一切让他读书，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个超越前辈、有所作为的人。1835年，郭嵩焘17岁。这一年，他考中秀才，在科举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第二年，家里送他到湖南最有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在岳麓书院，他与后来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曾国藩、刘蓉等结为至交。他们当时都是志大气盛、自视颇高的年轻学子，但曾、刘专攻程朱理学，后来逐渐向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方向发展，郭嵩焘则喜欢词章之学，带着更多的文人气质，因而，与封建正统就有些格格不入。曾国藩后来在评论郭嵩焘时，就直言不讳地说郭嵩焘只能著书立说，不适合做封建官场的繁重工作。1837年，郭嵩焘19岁，参加乡试，考中举人。1838年，郭嵩焘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直到1847年，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考中进士，入翰林，跻身到上层社会。

1840年，郭嵩焘经友人介绍，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其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郭嵩焘到浙后，亲见浙江海防之失，对浙江防务多有陈献。他对英国侵略者的入侵非常愤慨，“忠义之气，不可遏抑”。但由于清政府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缺乏起码的了解，又加之清政府上下在战争指挥上的失误，因此，自诩为“上邦大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被看不起的“岛夷”打败了。这一结局，对每一个有血气的中国士大夫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郭嵩焘亲历其中，更是感慨万千，他写了不少诗抒发自己的悲愤胸怀。这里选录两首：

三年沧海有奔鲸，烽火喧阗彻夜惊。
复道金缯归浩劫，枉从狐鼠乞残生。
鲁连无语摧梁使，季布何心续虏盟？
欲袖铁椎椎晋鄙，从谁改将信陵兵？
百丈飞船上海涛，诏书专下拥族旄。
烟沙隔水千军卧，弦管连营一曲操。
老将云间歌敕勒，宗臣江畔泣离骚。
杜陵偃蹇干时策，泪洒将军大食刀。

在这两首诗中，郭嵩焘表达了对贪生怕死、妥协投降的无比愤慨，也表示了自己愿意为国分忧、挥师歼敌的爱国情怀。

鸦片战争使郭嵩焘的内心世界受到很大的震动，也使他对西方列强有了最初的认识，他开始认真思考“洋患”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与刘蓉、张晓峰等友人一起讨论时局；另一方面，他读书览史，希望从史书中找到应世妙方。郭嵩焘在考察中国自古以来边患产生的原因及处置边患的措施后得出一

个结论：从古至今的边患，都不是由于敌人的强大造成的，而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处置失误造成的。他认为，在处理边患这个问题上，不能不问情况，一味主战，而要因时度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来审度利害得失，来确定战与和等重大举措。

鸦片战争时，郭嵩焘年方二十有余，血气方刚，但他在探讨时局时，并不是只在简单地抒发纵论天下事的书生豪气，而是开始着手探寻中国致败的内在原因。从此以后，郭嵩焘与“洋务”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二、湘军高参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把战争费用、赔款等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五口通商又使传统的手工业、陆路商业受到严重冲击，这样就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人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在急剧增加。从1840年到1850年10年间，各地小股“民变”此起彼伏，1851年爆发的金田起义最终把反抗政府的农民、手工业者汇聚到一起，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

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湖南。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全省震动。为躲避战乱，郭嵩焘兄弟带着全家老小避入湘阴玉池山梓木洞，同时进山避乱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兴名将”的左宗棠。左宗棠也是湖南湘阴人，才华横溢，精研地理、兵法、经济等学问，常以诸葛亮自比，自称“今亮”。当太平军打入湖南时，湖南巡抚张亮基根据贵州知府胡林翼的极力推荐，派人送重金礼请左宗棠到省协助军事。左宗棠摆出名士架子，没有答应。但就在这时，郭嵩焘却力劝左宗棠出山，干一番大事业。最后，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敦促下，终于踏上了镇压农民革命的道路。事有凑巧的是，在后来被称为清廷“中兴”的四位名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中，曾与李的出山也与郭嵩焘的力劝有关。因此，郭嵩焘在晚年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仍洋洋得意地说：“他们出将入相，都是我在关键时刻出了大力，也算奇了。”

郭嵩焘劝人出山，最后自己也被人强邀出来。太平天国运动在两湖如火如荼开展之时，湖南的地主阶级也在“保卫桑梓”的共同目标下形成一股日趋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郭嵩焘虽然深知自己文人气质太浓，出主意、当参谋还可以，但要亲自上前线，带兵作战，却是自己不感兴趣的。然而，当湖北按察使、同科举人江忠源在1853年以“为天下计”这顶大帽子压他时，他也就没有理由不出山了。因而，江忠源一激他，他也就参加到湘军这个大营垒里来了。这年5月，太平军围攻南昌，江忠源奉命率楚勇抵御。曾国藩又调罗泽南率一部湘军援南昌，郭嵩焘即随此军出征。从7月23日至10月28日，郭嵩焘追随江忠源，与太平军战于南昌、九江、湖北田家镇等地，屡战屡败，狼狈不堪。郭嵩焘未立寸功，又对艰苦的军旅生活不能适应，因而牢骚满腹。三个月后，他终于决计求归，与江忠源长揖而别。有趣的是，清政府却以他援江西有功，授为翰林院编修。

郭嵩焘在军中时间虽短，但对湘军和太平军的角逐却有深刻的认识。他看到太平军水师声势浩大，控制了长江水面，而清军和湘军只能进行陆地作战，对太平军的水师唯有望江兴叹，莫能奈何，因此，他建议江忠源急治水师。这个建议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上影响不能算小。但面对纷纷扰扰的世局，郭嵩焘没有激流勇进，而是激流勇退，甘愿在湘军中扮演一个摇羽毛扇的高参角色。从1853年到1856年，郭嵩焘一直追随曾国藩，为曾氏兄弟献计献策，同时又主持湖南厘捐，为湘军筹饷，作好后勤工作。

在这一时期，郭嵩焘还于1855年底奉曾国藩命到浙江筹办盐务，实际也是为湘军筹饷。但郭嵩焘此行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他看到了洋钱、洋人、洋货，读到了洋书，参观了英国兵船和墨海书馆。与外国人有了实际的接触，这一切使得郭嵩焘眼界大开，对西方的文明有了虽是初步的但却比较真实的了解。此后，他就自觉地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关注西方文明这个问题，并力图把西方文明中优秀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文化中来。

三、天子近臣

1857年12月，郭嵩焘离开了战火纷飞的江南，赴京任翰林院编修这一闲职。这表明郭嵩焘对没完没了的战事已深感厌倦，决定到北京另谋出路。

离开战火纷飞的江南，置身歌舞升平的京都，郭嵩焘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调兵遣将往天津防堵，而北京官绅却对此无动于衷，依然酒食征逐，醉生梦死。对此情此景，忧时忧国的郭嵩焘深感悲哀，同时他又为清政府不能重用曾国藩这样战功赫赫的忠臣良将而愤愤不平。

正当郭嵩焘事事伤感之时，忽然喜从天降。1858年8月31日，咸丰皇帝召见了。在封建社会，大臣被皇帝召见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1859年1月5日，咸丰皇帝又一次召见郭嵩焘。第一次召见，咸丰皇帝只问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这一次，咸丰帝开始征询郭嵩焘对国家大局的看法。郭嵩焘本来就自负才高，现在咸丰皇帝居然向他征询对天下大局的意见，就忘了一切，侃侃而谈。他断言太平军不足虑，大清江山可保。咸丰帝大为高兴。郭嵩焘又谈了很多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如讲求吏治、认真办事等，还大肆吹捧了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王鑫等湘军将领，虽然只字未提湘军首领曾国藩，但弦外之音，咸丰帝自然听得出。这次召见，咸丰帝对他非常满意，当天就发下谕旨，命郭嵩焘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皇帝的咨询机关，大臣入值南书房，虽然没什么实权，但可以经常与皇帝见面，以后往外放官，往往优先照顾，前程无限，因此又被称为“天子近臣”。郭嵩焘得此殊荣，真是神清气爽，心情就与此前很不一样。次日，咸丰帝又召见郭嵩焘，一方面鼓励郭嵩焘多读有用之书，作有用之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又向郭嵩焘打听湖南名士左宗棠，并让郭嵩焘劝左宗棠为国效力，建功立业。通过数次召见，咸丰帝对郭嵩焘已有基本认识，对他寄以厚望，并决定派他随僧格林沁前往天津前线，协助办理天津防务。一个月后，僧格林沁正式奏调郭嵩焘随同办理天津防务。这样，郭嵩焘不仅为湘军接通了与最高当局的直接联系，而且也使南方的湘军与北方的蒙古骑兵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湘军首领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兴奋得不能自己。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梦很快就破碎了。

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上奏陈说海防事宜。咸丰帝看完奏折，当即就要召见他。郭嵩焘在召见时，一时高兴，忘了官场忌讳，直言指陈时弊，并要求皇上、五大臣通下情，结果弄得咸丰皇帝很不高兴。此后，咸丰帝再没有主动召见过郭嵩焘，他的“圣眷”已经到了尽头，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在天津，他又与僧格林沁在海疆防务上意见不合，因而合作不到一起，关系闹得很僵。这年10月，诏命郭嵩焘前往山东查办烟台等处海口贸易税收问题，由僧格林沁派员协办。僧格林沁打算刹一刹郭嵩焘的书生傲气，于是派心腹李湘棻前往。李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给郭找一罪名，以博僧格林沁欢心。时机终于来到，郭嵩焘自定开局抽厘，引发了福山县聚众殴毁厘金局的事件，李湘棻以郭嵩焘开局抽厘未与自己商量为由，飞报僧格林沁，僧即据此为词弹劾郭嵩焘。1860年1月2日，郭嵩焘接到交部议处的诏命。回京后，他又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因此，他心情抑郁，不久即以病为由，奏请回籍就医。4月中旬，郭嵩焘怀着“滔滔天下，吾安适哉”的怅惘心情，离京返乡。郭嵩焘虽然才华横溢，作风正派，办事果断，但由于文人气质太重，无法适

应官场的圆滑机巧，又恃才傲物，因而，终究未能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充当“天子近臣”的机会。对郭寄予厚望的湘军首领曾国藩看到郭没能在中央站稳位置，为他深感遗憾。

四、洋务观初步形成

正当清政府以全力与太平军作战时，英、法侵略者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引起了全国性震动，英法联军打入北京，咸丰帝逃亡热河，结果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面对日益严重的西方侵略，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在分化，从50年末以后开始产生了一个新的派别——洋务派。这一派人物上有恭亲王奕訢等，下有地方实力派曾国藩等。他们在政治实践中，与洋人有了直接接触，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改变着固有“夷狄”观念，对于来自西方的侵略者及其文化开始进行认真研究和严肃思考，提出了中国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观点。于是，在国内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洋务思潮。就当时中国而言，这是一种代表进步的思潮。

郭嵩焘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对洋务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颇有特色的洋务思想。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他主张要了解西方，士大夫在这方面尤要身体力行。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流行着比较普遍的虚骄习气，不屑于谈论洋务。抱有这种成见的人对洋人“始则视之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情实”。这种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们一旦和洋人打交道，其结果只能是债事，把局面弄得更糟。郭嵩焘则不是这样，他主张正视中外交往的现实，不要回避，因为洋人既不是犬羊，又不是鬼怪，而是跟我们一样具有理智和文化的人。他们来华的动机可以考查，对于他们提出的非分要求可以用正当的方式予以拒绝，但是，中西互通已成定局，想拒洋人于国门之外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与他们达成一种中西正常交往的协议，划定章程，才是今天对待洋人的正确方法。如果把洋人视为野蛮人，不敢、不愿或不屑去研究、面对，都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和软弱。因此，他主张士大夫要抛弃“华夷之辩”的僵硬观念与恐惧心理，主动接触洋人，积极了解西方，研讨中国的对策。在1859年2月26日的奏折中，郭嵩焘向清政府提出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培养洋务人才的建议。虽然当时清政府没有采纳，但三年之后，北京却建立了一所培养办理洋务人才的同文馆。由此可见，在当时郭嵩焘思考这一问题时，具有深远目光。郭嵩焘之所以呼吁当局和士大夫们去了解西方，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通过一切可能的机会才了解西方情况的。他已认识到闭目塞听和开眼看世界这两种不同态度将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1840年在浙江，1856年在江浙，1859年在天津、山东，他都主动去了解西方的情况。60年代以后，郭嵩焘更是自觉地把开拓国人视野，矫正传统观念，宣传西方科技、文化、思想视为自己的责任，纵使被守旧的士大夫讥嘲、打击也不后悔。他的这种一心为国、不计个人荣辱的胸怀给后来者留树立了榜样。

第二，他对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守旧士大夫的虚骄之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总评价是：“处极弱之势，无可据之理，又于外夷瞽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这种批评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近代以来，中国已明显落后于西方，而清政府却不去了解敌情，仍以天朝大国自居，因而，在不得已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时，采取的应变措施，不是错误百出，就是授人以柄，最后总是以丧失利权收场。而中国的士大夫不但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反而去助长政府的这种虚骄之气。于是“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撓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严肃地指出，士大夫们的高谈阔论虽能博取爱国的空名，却无补于实际，只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尊严。

第三，他反对一切对外战争。郭嵩焘从中国国势不如西方列强这一认识出发，认为清政府应委曲求全，不能与西方列强开战，只能徐图发展。这一思想虽然纠正了崇尚清谈的守旧士大夫盲目主战的错误，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避战求和也是有条件的，西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是昭然若揭、清楚不过的。一味求和，只能助长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而不会消弭他们的侵略欲望。而郭嵩焘却对这些不管不顾，因此，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郭嵩焘的思想过于消极，是很偏颇的。

总之在五六十年代，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基本形成，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失误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却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而且，郭嵩焘很注重宣传、解释他的洋务思想，逐渐成为洋务派中独树一帜的洋务思想家。

五、再次出山

1859年，郭嵩焘因僧格林沁参劾愤而辞官南归，在家闲居。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援上海，旋升江苏巡抚。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李鸿章保荐同科进士郭嵩焘任苏松粮道。郭嵩焘因第一次出任碰了大钉子，所以，心存犹豫，不想再出，但又经不住曾国荃、刘蓉、李鸿章等好友的再三苦劝，遂于这年10月赴上海接任。

在任苏松粮道期间，郭嵩焘看到所辖的苏州、松江、太仓等三府赋税太重，往往因此激起民变，因而向李鸿章提出了减赋的建议。1863年6月，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减轻苏松太三府粮赋。7月9日，清政府批准了曾、李的请求。此举的实行，普遍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好感。郭嵩焘作为这项措施的倡议者，其本意是在维护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客观上却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当地百姓办了一件好事。与此同时，郭嵩焘官升两淮盐运使，他又通过整顿盐厘的措施，搜刮到大量财富，为湘淮军筹集了巨额饷银，因而，也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交口称赞。不久，郭嵩焘即被奏保升任广东巡抚。

在这一时期，郭嵩焘对西方的科技进步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他亲见英人为淮军燃放“开放炮”，深感洋人兵精而器利。1863年3月，他到沙利洋行参观机器生产，对洋人的生产技术叹为观止。由此，他深深认识到，中国要想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只有向西方学习，除此别无它途。这时，正好他的好友冯桂芬向李鸿章提议在上海设立与北京同文馆类似的学校，用来培养洋务人才。冯桂芬的这一建议得到郭嵩焘的积极响应。当李鸿章接受这个建议向清政府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时，郭嵩焘为即将开办的这所学堂（后定名为上海广方言馆）拟订了章程14条。因此，可以说，对近代中国的第一批外语学校，从北京的同文馆到上海的广方言馆以及继之而起的广州同文馆，郭嵩焘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863年6月，因郭嵩焘在两淮理财有方，又有通晓洋务之名，于是清政府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主管一省民政。9月6日，当郭嵩焘得知官升广东巡抚的消息后，兴奋不已，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以展平生抱负，当即上奏清政府，陈述了振兴军事、整顿吏治、清理厘务的宏大计划，颇为清廷赞赏。10月23日，郭嵩焘抵广州，接任广东巡抚。

广东海关收入颇丰，但大小官吏从中渔利，富商又与洋人勾结，躲避官府勒索，所以，清政府早有整顿之意。这次郭嵩焘向清政府陈述了自己的施政计划，清政府很快就同意他将军务、饷务、吏治分别轻重缓急，次第整理，于是，郭嵩焘急于作出成绩。但事情并没有郭嵩焘想象的那么容易。郭嵩焘在上任的第三天，就下劝捐之令，结果不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闹得民间鼎沸。因劝捐损害了当地富室大户的利益，结果在北京的广东士大夫也有不满。郭嵩焘的这一举措，虽然旨在为清政府搜刮财富，但因触犯了广东地方大大小小的地头蛇的利益，反对声浪很高，清政府于是降下严旨查问事由，郭嵩焘顿感内心受到严重挫伤。加上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以及继任的总督瑞麟合不到一起，因而，工作起来，苦不堪言。不久，又与闽浙总督左宗棠发生矛盾，终被左纠参去职。

在广东巡抚任内，郭嵩焘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他与英国领事罗伯逊等频繁往来，广泛了解西方的经济、军事、政治及其它方面的情况，他

还曾与罗伯逊反复商谈华人制造轮船之事。1864年6月,在郭嵩焘的主持下,广州同文馆正式开馆,从此,清政府又多了一个与西方交流的窗口。1866年4月,清政府将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呈《局外旁观论》及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的《新议略论》发交各省督抚“妥议”,各省督抚纷纷复奏。郭嵩焘因为去职在即,所以只把自己的意见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总理衙门。在信中,他对清政府的政治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清政府对外对内实行的都是瞒和骗的政策。譬如对清政府的禁海政策,他认为自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轮船出海贸易,已是利之所在,虽禁不止。更为严重的是,广东等沿海商人为了逃避政府的勒索迫害,已有人与洋人深相结纳,依附洋人制造火轮船,因为有洋人为靠山,清政府地方官不能过问。这样的“海禁”政策,对政府、对百姓都不利,得便宜的反而是洋人。为此,郭嵩焘建议清政府在沿海设立市舶司,主管出海商船的贸易,并准允商人制造火轮船,对于商办轮船制造业不能歧视,而应与官办企业一视同仁。他的这些批评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

1870年以后,洋务派开始兴办民用工业。当洋务派在大肆鼓吹兴办民用工业是求富的要策时,郭嵩焘却一眼洞穿了洋务派兴办的官办企业的体制弊病。他指出,官办企业把官场作风带到企业中来,结果必然是贪污贿赂之风盛行,资财落入个人私囊,而在技术上又处处受洋人掣肘。因此,郭嵩焘大胆提出企业商办,建议清政府依靠商人与洋人争利角胜。但可惜的是,郭嵩焘的这些建议没有得到洋务派的响应,也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而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的命运却被他不幸而言中。

六、罢官赋闲

1866年，广东巡抚郭嵩焘的解职与左宗棠大有关系。1864年7月，天京失陷，太平军余部退往赣、闽、粤边境。清政府命左宗棠带兵前往镇压，太平军在福建难以立足，被迫转入广东。左宗棠奏请调江西鲍超部霆军人粤会剿，但郭嵩焘担心军纪很坏的霆军扰粤，遂与两广总督瑞麟会奏，声称太平军有进攻赣湘动向，让霆军严防本境，不必入粤。清政府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左、郭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粤军怯于战斗，无法承担剿灭粤境太平军的任务，而瑞麟又喜欢吹虚，不断向清政府谎报战功，遭到清政府的严厉申斥，郭嵩焘也跟着受过。1865年9月底，左宗棠部将康国器、关镇邦等在追剿太平军时，遭遇太平军的埋伏，死伤惨重。左宗棠认为是粤军会剿不利，于是就毫不客气地“从严参办”瑞麟和郭嵩焘。左宗棠第一次纠参郭嵩焘是在1865年10月26日，谓粤军会剿不利，并向清政府暗示瑞麟、郭嵩焘不是治军之才。11月6日，左宗棠又第二次纠参郭嵩焘，称广东督抚谎报军情，致使太平军汪海洋部迟迟不能剿灭。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第三次弹劾郭嵩焘，直接指出他办理厘捐不善，致使军饷不足，要求以部将蒋益澧代郭抚粤。清廷为之所动。3月6日，左宗棠在镇压了粤境的太平军后第四次奏劾郭嵩焘，称广东督抚“明于小计，暗于大谋”，并非合适人选。这四次纠缠，虽然两广总督瑞麟也在被参之列，但是，瑞麟是满人，后台硬，左宗棠搬不动他。而郭嵩焘却终于被他纠缠去职。

郭嵩焘初升广东巡抚时，雄心勃勃，以为施展平生抱负的机会终于到了。但两年多的巡抚生涯却使他焦头烂额，苦不堪言。他几乎处处碰壁，既为地方士绅所反对，又与同僚、上司闹不合，甚至有生死之交的左宗棠在关键时刻为了争镇压太平军的全功也把他置于难堪之地。晚清官场流行着“多叩头，少说话”的六字诀，而郭嵩焘偏偏要自恃才高，反其道而行之。李鸿章、曾国藩在他接任之初多次建议他治粤不可过急，而他却求功心切，恨不得一下子把个乱糟糟的广东治理得井井有条，又是纠缠下属，又是劝捐，结果弄得上下都不满意，他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一再纠缠，逼使郭嵩焘最后只好主动请退。1866年5月14日，郭嵩焘正式接到解职上谕。6月16日正式交卸。他没有回京述职，而是告假回乡，甩手不干了。

1867年5月，郭嵩焘与辞官回乡的好友刘蓉泛舟洞庭湖，登君山，兴致很高，宠辱皆忘。但郭嵩焘在家闲居的日子并不总是这样潇洒，他每天除了会客、读书、著书外，还种菜、植茶、养鱼。有时也找几个和尚谈诗论佛。这样过了几年，1870年，郭嵩焘又移居长沙，主讲城南书院。湖南地处内陆，守旧风气极盛，而郭嵩焘又以洋务知名，平时喜谈洋务，因而学生们有时就故意与他作对。他执教不久，书院就传出一副对联：“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郭嵩焘非常生气，下令停课，决心查个水落石出，但追查的结果，却是查无实据，找不出写对联的人，只得不了了之。

1870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清政府命曾国藩负责处理这一棘手的案件。郭嵩焘闻讯，致书曾国藩，劝他回籍养病，免遭非议。但曾国藩却无法摆脱压到肩上的担子，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处理结果，天津民众成了这一教案的牺牲品。曾国藩则被朝野骂为卖国贼，在日记中，曾国藩也深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1873年，郭嵩焘所撰《礼记质疑》成书。此书始作于1852年，历20年而成，用功很深，因此，颇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推崇。

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害琉球渔民兴师犯台，同治年间中外和好的局面被打破。清政府顿感人才缺乏，洋务棘手，于是，又重新起用在镇压了太平军以后被罢职的一大批文臣武将。7月21日，清政府命杨岳斌、曾国荃、郭嵩焘及丁日昌、鲍超、蒋益澧等进京商讨国事。这样，郭嵩焘又结束了长达8年的闲居生活，重新卷入清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七、出使之前

1875年春，郭嵩焘来到北京。因有李鸿章的一再推荐，他满以为能得到相当于巡抚一职的官衔。但是，3月16日御诏传来时，他却只得了个福建按察使的官职。这表明清政府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以及对他在广东巡抚任内的政绩评价都不很高，从而使郭嵩焘刚刚发热的心又凉了下來，是去是留，犹豫不定。

正当此时，清廷内部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关于兴办洋务的大争论，郭嵩焘也被卷入其中。

事情的起因是：1865年阿古柏入侵南疆，1871年沙俄又以新疆动乱为由，出兵侵占伊犁，这就造成了西北边疆的严重危机。而在西北边疆危机还没有转机时，日本又趁火打劫，入侵台湾，于是又引起了海疆危机。这样，在清廷内部出现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一派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主，主张弃新疆，挪塞防经费加强海军；一派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首，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要求收复新疆。最后，左宗棠一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在这场争论中，郭嵩焘主张兼顾水陆之防，海防与塞防并重。在新疆问题上，他认为应由左宗棠负全责，或进或止，酌情办理。

台湾问题终以清政府的妥协退让、订立《北京专条》做结。1874年11月5日。主管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针对台湾事件的处理上了一个筹议海防的奏折。奏折承认台湾事件虽然日本明显理屈，但之所以以妥协退让作结，是因为清政府的海防空虚，别无选择。接着，奏折指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虽有自强之心、自强之言、而无自强之实的原因在于“同心少，异议多”。于是又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措施，做为自强求富的总方针。清政府当天即把这个方案发寄给李鸿章、沈葆楨等15名沿海沿江的督抚大员，要他们限期回奏。11月19日，原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奏陈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清政府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这个条陈比总理衙门的六条更具体、更激进，清政府也寄发给各督抚大员讨论。于是，继同文馆的争论后，在清政府内部又掀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关于兴办洋务的大讨论。

各地督抚的复奏很快送到北京。关于练兵、简器、造船等项，各派没有原则分歧，但对于筹饷、用人两项，意见则很不一致。1875年3月6日，总理衙门奉旨，派亲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讨论各地大员奏折中提出的问题。这些守旧的京官们总体上仍持反对态度，但态度比较谨慎，以一种不痛不痒的言词把洋务派提出的方案予以否决。正当这场讨论进入高潮之际，郭嵩焘以福建按察使的身份给总理衙门上了一个条陈，从这一条陈可以看出郭嵩焘对洋务的认识与思考已经远远走在洋务派的前面。郭嵩焘已经认识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中国要求富强，必须注意西方的国政、军政，从根本上了解西方的长处。他支持造船、制器、设厂，但更强调知己知彼，从长远利益着眼，逐渐达到富强。他提出的具体的方案是：1、急通官商之情；2、通筹公私之利；3、兼顾水陆之防；4、了解本末之序。郭嵩焘力求从本源上探寻中西政治之差异，从总体上把握兴办洋务的大局，这是他比别人先进之处。1875年5月30日，总理衙门对这场争论进行了总结，基本上肯定了洋务派的意见，但也对顽固派作了妥协让步。

1875年2月，还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马嘉理案”，中英为此大开交

涉。交涉结果之一是清政府同意派郭嵩涛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道歉。中英交涉时，郭嵩焘已离京赴任，9月8日，郭嵩焘得到正式消息时，还是心潮激动，因为清政府在处理这项棘手的中外交涉时，没有忘记他。11月末他匆匆赶到北京。12月1日，清政府任命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从按察使升到兵部侍郎，郭嵩焘心理非常激奋，因而，很快就向清政府奏陈自己对此案的处理意见，在这份奏折中，郭嵩焘提出，各国之间的往来应以礼相接，西方国家可资取法者很多，而士大夫不明时势，一意诋毁，以致屡生事端，马嘉理案就是例证，因此，他主张将岑毓英交部严议。郭嵩焘的这一意见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言论针锋相对，因而遭到守旧士大夫的猛烈攻击，以致他奉派出使也成了士大夫嘲笑、讥评的材料。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劝辞者有之，嘲笑者有之，惋惜者也有之。北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流行的一副对联最能代表士大夫的心态，对联是这样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而闹得更凶的还是他的家乡湖南。1876年10月4日，参加乡试的考生在长沙玉泉山集会，声讨郭嵩焘。他们还扬言要砸郭嵩焘的家，把郭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湖南巡抚王文韶闻讯心中大喜，不但不制止，反而夸奖考生们。恭亲王奕訢为此发函责问王文韶，王居然也置若罔闻，不了了之。

郭嵩焘受到这样大的打击，心情十分复杂，在朋友的劝说下，他就不想出使了。他一再向清廷告病假，要求回湖南养病。但西太后于1876年3月4日、9月6日两次召见郭嵩焘，对他多方慰藉，使得郭嵩焘退无可退，只能一心向前。但出使前的这一段遭遇已经预示着他的出使将是一件备尝艰辛的苦差。

八、第一任公使

1875年8月28日，清廷正式发布郭嵩焘出使英国的上谕。此后由于中英之间在马嘉理一案上反复交涉，没有结果，郭嵩焘出使之期也就一再拖延，直到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出使才又提上日程。12月2日晚，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德明、凤仪和英国人马格理以及随行翻译爱尔兰人禧在明等30余人从上海港冒雨登舟，踏上了赴英的漫长旅途。郭嵩焘使团是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遣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节团。这一年，郭嵩焘59岁。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以老病之躯赴万里之行，从而为清政府迈出了正式向外遣使的第一步呢？一个基本原因是他的身上具备了传统士大夫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美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希望亲自到西方国家去考察，然后把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形介绍给国人，从而使守旧风气比较重的中国人能够从天朝大国的梦中醒过来，平等地看待西方。所以，虽然在出使前，他就受到了守旧舆论的攻击，身体又是衰病交加，而出使的本身又等于“悬的以资弹射”，但他却没有后悔，没有推卸，而是一力独任。他的这种高尚情操在当时只有少数比较先进的中国人能够理解，在今天，则早已得到历史的公允评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洞开，中外交往日益频繁。但由于中国政府对西方社会缺乏了解，在中外交涉中往往吃亏，所以，清政府越来越迫切地需要了解西方国情。因此，在郭嵩焘出使之前，总理衙门就奏请清政府要求出使大臣将对外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详细记载，随时咨送国内。郭嵩焘按此要求，从上海启程之日起，就不顾海上颠簸、牙痛、胃痛、失眠、头昏、晕船等，坚持天天记下沿途见闻，直到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止，没有间断。他把途中30多天的记录整理成册后，题名《使西纪程》，邮寄给总理衙门。结果却在士大夫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使西纪程》记载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地理知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概念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还是模糊一片，以后逐渐有所了解，但一般士大夫对世界有几大洲、几大洋、如何划分经纬度，如何计算时差、温差等地理知识仍是所知无几。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详细记载了所经之地的经纬度、温度、气候以及自然景观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二是不同的人文景观。他途经香港时，发现香港变化很大，已成为西方国家在东方的一大都会，学校纪律严明，监狱也节度整齐。在新加坡，他参观了配有大炮、火药库、巨型望远镜的新式炮台，还参观了女子学校。在途中，他还看到了西方的报纸如《泰晤士报》、《波赛日报》等，从报上了解了1874年至1876年的英国人北极探险和土耳其的政治改革情况。在苏伊士运河两岸，他看到了构造巧妙的开河机器。到欧洲后，他又看到了压沙机器、取重机器、蒸汽机等。他对马赛、伦敦的繁华，也留下了真实的记录。郭嵩焘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因而，在《使西纪程》中，他除了纪实外，还经常发表个人的评论。这些评论直抒胸臆，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一切人文景观都含赞扬之意，因而，士大夫看了，就不对胃口，反过来就要对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大张挞伐。郭嵩焘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西方国家非常重视教育，也重商业，在当今世界，英国和俄国是世界的两大强国，都对中不怀好意。在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士大夫还一味“高谈阔论”、“虚

骄自大”，后果将不堪设想。郭嵩焘的这一观点虽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但是，守旧的士大夫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样的话，因而，在总理衙门将《使西纪程》刊布社会后，士大夫们群起而攻之就不奇怪了。

李慈铭是当时的名士，他读了《使西纪程》后，不但不愿承认中西发展的差距，而且斥责郭嵩焘对西方国家进行了故意夸张、粉饰，尤其是夸饰西方的“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因此，他说，凡有血气的士大夫读了郭嵩焘的记述，“无不切齿”。有人说郭嵩焘对清政府的“忠心”已经改变，对英国有贰心。他的好朋友王闿运也指责郭嵩焘中了“洋毒”，不可救药。有人甚至奏请清政府将郭嵩焘撤职查办。在守旧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止该书在社会上流行。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清政府才暂时没有将郭嵩焘撤职，但已对郭嵩焘发去了严厉申斥的训令。

郭嵩焘使团到伦敦后，住在波克伦伯里斯 45 号，这里有一座四层楼房，此后成为中国驻英使馆，沿用了 80 多年。1877 年 1 月 24 日，郭嵩焘照会英国外交大臣德尔贝，商订觐见日期。在照会中，他增加了所携带的国书中所没有的两项内容：一是“道歉”的软差同时即是长驻公使，二是增加了副使刘锡鸿的名字。英国人存心要刁难中国的第一任驻外公使，所以在以上两个问题上又争论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答应下来。入国先问禁，郭嵩焘在觐见前曾派人向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内务大臣席摩尔询问有关觐见礼仪，他们也故意刁难，借口说不知道，希望中国公使在觐见时出丑。郭嵩焘是一位热心了解西方的人，因而在出国前就详细问过在此之前出国的薄安臣使团和崇厚使团的情况，所以在 2 月 7 日觐见时，行的是三鞠躬礼，而不是中国官场的跪拜礼，使得威妥玛等未得售其奸。鉴于这些，郭嵩焘深深感到西方国家对采取的不平等态度，内心为之愤愤不平。为此，他招集所有使团人员，宣布了 5 条纪律：“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游荡，五戒口角喧嚷。”

郭嵩焘不懂英语，在对外发表谈话时，须经英人马格理翻译。而马格理常常歪曲郭嵩焘的原意，因而见诸报端时，往往差别很大，郭嵩焘虽然气得发昏，却也无可奈何。此后，他多次提到，外交人才，须以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外交官要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立足，真是困难重重。做为第一任公使，郭嵩焘虽然想要为清政府多办点事，但事实上却不可能改变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在任期内，郭嵩焘尽最大努力处理了一些中英交涉，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中国从此真正进入了世界外交舞台。

郭嵩焘在任期内经办的交涉主要有以下几项：

1. 江西盐船案。1875 年 11 月 16 日，华商周复顺等所雇运盐船只被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悖信”号撞沉，周复顺等告到上海英国按察司衙门，结果“悖信”号被判定赔银 1 万两。但“悖信”号船主不服，声言要回英国上告，此后即杳无音信。周复顺等闻郭嵩焘出使英国，就函请他代向英国船部查询。1877 年 2 月，郭嵩焘收到信后，多次与英外交部交涉，终于如原告所请，以“悖信”号赔偿结案。

2. 镇江趸船案。1873 年 3 月中国海关允准英太古洋行“嘎的斯”号停泊于镇江英租界对面，此后，太古洋行在该船停泊之处擅自造桥通岸，致使

江岸多有坍塌。1876 年中方为查明江岸坍塌原因，要求太古洋行将趸船移泊，几次交涉都没有成功，总理衙门遂将此案转寄郭嵩焘，要他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1877 年 6 月，郭嵩焘开始与英政府就此问题进行交涉，直到 1878 年 2 月，英方才答应将镇江趸船移泊。此案的交涉成功，意义不在案件的本身。移泊一条船，交涉达 3 年，争论的本质在于国家的主权，郭嵩焘在此案上取得成功的意义也在于他维护了清政府对本土内的江河道路的主权。

3. 厦门怡记行商人枪毙渔民案。1876 年，福建厦门英属怡记行雇员安陀鸟枪杀当地渔民王小加、庄薄，中方多次与厦门英领事及驻华公使交涉，要求惩凶，未果。总理衙门只好函知郭嵩焘，令他在英交涉。1878 年 4 月，郭嵩焘接到函件，旋即开始与英方接触，英方则采用拖延战术，迟迟不做答复。郭嵩焘感到要公正解决此案实在太难，只好退而求其次，最后英方同意以给死难者家属抚恤金结案。此案的处理并不公正，但郭嵩焘还是尽了自己的努力。

4. 英船雇佣华工案。1878 年 7 月 21 日，英船“拉多晒”号所雇华工 7 人到中国驻英使馆求援，控告船主暴虐，要求辞职而船主又不允。次日，郭嵩焘即派参赞黎庶昌等去调查此事，后又与英政府联系。最后，该船主函告中国使馆，接到政府命令，准许华工辞职。

5. 域多利华工免税案。1878 年 6 月，加拿大域多利埠规定华侨每人每年须交税银 40 元，拒交者将其货物充公。这种专对华人征税的措施引起华侨强烈不满，他们联名请求中国驻美公使保护。因加拿大是英属殖民地，中国驻美公使遂又转请郭嵩焘向英政府交涉。郭嵩焘旋即照会英政府，英外交部很快复文称已命该埠校办。

6. 喀什噶尔交涉。侵入南疆的阿古柏集团在左宗棠所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阿古柏派人急往伦敦向英国政府求援。1877 年 1 月，郭嵩焘抵达伦敦后，英方即向郭交涉意在保护阿古柏政权。此后，交涉一直持续到 1878 年清军收复南疆全部为止。在这一交涉上，由于信息传递不便，郭嵩焘不能及时得到最新消息，加之，他对清军武力收回新疆信心不足，希望利用英国的调停，迫使阿古柏多交完一些地区，准其保留一部分土地立为中国的属国，以此来维持两北边疆的和平局面，从而，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他仍强调，在新疆问题上，或进或守，清政府应重视当事者左宗棠的意见。而作为一名外交官，郭嵩焘与英方也做了一定的斗争。由于通讯上的不便，郭嵩焘对新疆局势的变化不能及时了解，因而难免受英国政府的诱惑。但是，在总体上，他的立场是坚定的。他一再拒绝了与阿古柏的使者会见；当英方非法派遣所谓驻喀什噶尔公使时，他又立即提出抗议；当英方散布中国公使私行议和的谣言时，他也严辞辟谣，从而，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7. 倡议设立领事馆。1877 年 9 月，郭嵩焘奏请清政府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在新加坡、孟加拉、槟榔屿、锡兰等华侨集居之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在设立领事的交涉中，英方在常设还是暂设问题上横生枝节，总理衙门即命令郭嵩焘与英政府交涉。1878 年 1 月，英方同意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3 月，清政府任命华侨商人胡璇泽为中国驻新加坡领事。此后，清政府先后在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立了领事馆。

郭嵩焘出使的时间并不长，外交上的建树也不如曾纪泽等突出。但他却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迈出了清政府向外派遣常驻公使的第一步，他的这种大胆创新、忠正爱国的精神不断激励着后来许许多多的外交官们。

九、对西方国家的考察

郭嵩焘在出使期间，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民俗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他把外交工作之外的时间几乎全都用于参观考察，考察之后，都留下详细的文字记录，这为国内的士大夫们了解西方提供了一条简捷的途径。

1. 教育与社会进步。在出使之前，郭嵩焘就已初步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与西方人对教育的重视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出使后，他对西方学校教育的考察非常重视。在到达英国之初，他就拜访了很多知名学者，聆听这些学者关于电、化、光、热学的演讲。1877年5月9日，他参观了一所艺术学校。1878年1月21日，他参观了一所小学，对西方的小学教育留下深刻印象。1878年6月8日，郭嵩焘参观了英国皇家医院，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数万件生物标本，其中包括人体标本。1878年7月5日，郭嵩焘在法国参观了一所技工小学。他的每一次参观都非常认真，把所见所闻都详细地记下来，有时还发表自己的感慨。郭嵩焘看到，西方人在走出学校之后，还有一种普遍追求实学的风气，这是与中国士大夫的空谈很不相同的。在一次茶会上，郭嵩焘听说英国探险家法兰克林考察北极，一去不返，而他的妻子又奋然前往，最后终于到达北极，发现了法兰克林等人的尸骨及遗留的笔记，初步揭开了北极之谜。对此，郭嵩焘大发感慨，他认为西人立志专一，百挫不怨，因此，“天地之秋，亦有不能深闭因拒者矣。”

西方社会重视教育、人人喜欢追求学问的风气也感染了郭嵩焘，他以花甲之年，还热心旁听各种学术演讲，观看各种科学实验。他的足迹遍及邮局、铸钱局、军火工厂、博物院、图书馆、天文台、水族馆、救火局、兵船等地方，每处都留下了他倾心学习的记录。他无论身体有多疲劳，日记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他还鼓励留学生也坚持记日记。1878年6月2日，他检查了严复等留学生的日记，留下了7000多字的记录。由于他非常关心西方的科学研究，又勤奋好学，因而，他很快就懂得了有关热学、电学、光学、声学等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1877年10月16日，他还亲自与随员试验了西方刚刚发明的电话。

郭嵩焘考察了西方的学校教育之后，深深感到，“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他还想到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只学一些时文、小楷，不求实际，实是误人不浅。他大声疾呼，追求实学是当今中国的急务。郭嵩焘多次给当权的洋务派官僚李鸿章、沈葆楨等写信，希望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兴办新式学校，讲求实学，扭转社会崇尚空谈的风气。他还建议中国派遣的留学生除少数人学习军事外，多数人应该改学冶矿、铁路、电学、法律、经济等。郭嵩焘指出，西方教育越先进，对中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既然已经被打破，唯一的出路就是奋起直追，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逐渐以西方的“实学”取代传统的“虚文”，也就是以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取代传统的封建教育。

2. 民主政治与西方文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中国的君主专制截然不同，长期生活在中国专制社会的郭嵩焘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始而惊讶，终于羡慕。到英国之初，他感到英国的议会讨论与中国官场的各立门户没有两样，都以“互相攻击取胜”。后来，他多次去议院旁听，感觉就起了变化。他发现，英国凡有大事，都必须交议会讨论，两党互相辩论，政府要接受议

员的质问，然后还要在报刊上发表消息，广泛流传，所以，执政党就不敢恣意妄为。这种情形与中国官场的派系斗争完全不同。由此，他对英国社会的新闻自由、舆论制约政府，议会对政府进行干预等政治民主十分赞赏。他还特意研究了英国议会民主的历史，做了很详细的笔记。他记录了1264年英国国会的雏形以及后来的市民政治、陪审员、律师制度，还记录了英国的海上商路的开拓、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商会的设立以及与各国通商的历史。他在研究了英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日益强大的根本，在于它源远流长的民主政治。这种政治体制造就了无数人才，奠定创立各门学问的基础，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郭嵩焘还坚信，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比中国的君主专制要优越。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好坏系于君主一人，而不同的君主品德也不一样，个别贤能的君主其统治也不能久长，而西方政治的好坏取决于社会和人民，这种制度能够长久延续，而时间越长，其制度就日趋完善。他总结说：中国“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他更担心的是，西方的法治正在向全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德治”却不能招架，所以，西方的“法治”越完备，中国的危机就越深。

同时，郭嵩焘也认为民权过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病。民权过重，容易导致“民气骄横”，他认为英美工人的罢工就是这种弊端的表现。

3. 社会风俗。郭嵩焘对中国官场“专以大言自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虚文客套非常厌恶，因此，当他看到西方社会有一种普遍的“实事求是”的风气时，非常羡慕。郭嵩焘认为，这种西洋风俗的形成植根于西方的政治教化之中。政治上民主，人们对于国事可以畅所欲言，教育方面重实学，学生们就养成了独立思考、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这样，整个社会就形成了讲求实际、不务虚文的风尚。西方社会由于人人讲求实际，因而，就表现出勃勃生机，科学发明层出不穷，社会景象日新月异。而西方社会在近代以来取得的物质文明的重大进步又促进了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反过来，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密切也推动着物质文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郭嵩焘很注重中西对比，他认为，西方求实际，中国讲虚夸；西方重创新，中国讲保守；西方主开放，中国主关闭。

总之，郭嵩焘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西方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他考察的目的是要弄清楚西方社会日渐富裕强大的原因，并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西方的一切长处，迎头赶上，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

十、从欧洲看日本

中国打开国门的时间要比东邻日本略早，但国门被打开后，中国仍像一头睡狮，踟蹰前行，步履蹒跚，而日本却能迅速崛起。郭嵩焘在出使期间，对这个东邻也付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

郭嵩焘首先注意到日本的留学问题。他发现，日本在英、法等国留学的人很多，成份也很复杂，包括一些政府大员如相当于清政府户部尚书的大藏省大辅井上馨等也前来学习、考察。日本人在西方学习的内容也很广泛，很多人精通外语。相比之下，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人数少，出身低微，又专学军事，外语水平也较低。他对此感触很大，曾写信给主持洋务大局的李鸿章，要求让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一部分继续学军事外，其余的改学矿冶、铁路、电学等实学，以求实用，并希望各省多派年轻学子出国留学。但是，保守、落后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他注意到日本使馆的外交活动非常积极，并且见成效。郭嵩焘一直和日本驻英公使接触频繁，从接触中他了解到日本国内进行的官职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以及军事近代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他对日本变化的迅速惊讶不已。他注意到，日本的外交官经常主动向英国社会各界和驻英各国公使介绍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为日本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社会制造舆论。凡有可能参加的国际会议，如整理万国刑罚监牢公会、万国公法会、信局章程会等，日本公使都积极参加。郭嵩焘有时也希望积极参加国际外交活动，但是，由于事事须向清政府请示，动受掣肘，所以，往往身不由己，徒增浩叹。

第三，郭嵩焘还注意到日本在积极摆脱国际困境，以自己的实力争取与西方国家平等相待。日本与西方列强交往的最初阶段，也和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丧失了不少主权。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从政治、经济、教育多方面借鉴西方的制度，在全国推进资本主义化，向西方国家看齐，因此，国力逐渐上升。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上下一致要求换回失去的主权，以平等的资格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郭嵩焘出使英国之时，日本驻英公使就在为邮政问题积极与英国交涉。双方交涉多年，仍无结果，但日本公使却百折不挠，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进取精神。由此，郭嵩焘感到日本正在勃然兴起，将成为东方一霸。郭嵩焘既为东邻日本的崛起而高兴，同时也为清政府的守旧衰落而忧心忡忡。他担心日本的强大将构成对中国的威胁。1877年，日本在英国订造的“扶桑”号军舰下水，日本使馆为此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郭嵩焘在祝贺宴会上表示，希望日本的“扶桑”号，除非是帮助中国，否则不鸣一炮。不幸的是，在17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扶桑”号参加了这场战争。

十一、正副不和

郭嵩焘出使时，总理衙门的守旧官僚李鸿章等为了制约郭嵩焘，就故意派了一个思想保守的刘锡鸿作为副使。刘锡鸿走出国门时，就奉有监视郭的指令，因此，他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带，随身携带的就是时刻准备弹劾郭嵩焘的奏章。由此不难推断，郭嵩焘的出使确是一趟苦差，他既要与西方列强在外交领域做斗争，又要对付国内的保守派以及自己的下属刘锡鸿这样的小人。

到英国后，虽然郭嵩焘在给英外交部的照会中列了副使刘锡鸿的名字，但由于所携带的国书中没有列副使名目，因此，英外交部不准刘锡鸿觐见英国女王。后经郭嵩焘一再交涉，英方终于同意，而刘锡鸿的内心却感到受了侮辱，很不愉快，赌气奏请清政府裁撤副使。后来，伦敦的报刊在介绍郭、刘二人的情况时，也扬郭而抑刘，使刘锡鸿更为恼火，于是就开始把心中的怨愤发泄到郭嵩焘头上。不久，郭嵩焘即觉察到刘锡鸿发往国内的信函奏稿，一意迎合国内的保守舆论，把矛头指向了自己，于是，两人关系就陡然紧张起来。1877年4月，清政府为调解郭、刘矛盾，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刘锡鸿闻讯后，更加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开始在使馆内痛诋郭嵩焘，把郭不放在眼里。使馆内的随员早知刘锡鸿有总理衙门与军机处为援，到此就有不少人站到了刘锡鸿一边，这无疑是在火上加油，使郭、刘矛盾迅速激化。1877年9月4日，刘锡鸿从爱尔兰访问归来，借口询问俸薪等事，与郭嵩焘大吵大闹，拍案狂叫。郭嵩焘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召集参赞、翻译、随员等，声明欲与刘锡鸿解开矛盾，消除嫌隙，并要他们先到刘锡鸿处询问构隙原由。当众人往问刘锡鸿时，刘锡鸿却大骂郭嵩焘为汉奸，必不能容，并指陈郭出使以来犯下披洋人衣、起立迎接巴西国王、听音乐会时索阅音乐单等三大罪。郭嵩焘才认识到刘锡鸿已被总理衙门所利用，是总理衙门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一颗钉子。刘锡鸿的所作所为，就是要迎合总理衙门的旨意，罗织罪名，置自己于死地，因此，郭、刘关系没有缓和的余地。此后，刘锡鸿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势，接二连三上奏朝廷、致函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和中国驻美使馆，攻击郭嵩焘崇洋媚外，全失大臣之礼，声称不愿与郭共事。郭嵩焘也只好到处发函，为自己辩白。但清政府没有制止刘锡鸿的乖戾行为，这使郭嵩焘感到使事已一无可为，于是，一再奏请调回。清政府基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使人员，不得不对郭表示安抚，1878年2月23日又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但不久，郭、刘矛盾又再次爆发。1878年5月6日，刘锡鸿迎奉总理衙门意旨，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进行严词弹劾。刘列举郭的十大罪状是：1、诋毁时政；2、欲使朝廷杀毓英以取悦英人；3、不尚左而尚右；4、考定国旗样式；5、蔑视谕旨；6、对洋人一味卑恭，有损国体；7、摹仿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不以忘本为耻；8、让夫人四出应酬，有违中国闺教；9、与威妥玛闭门密语；10、对朝廷不满，心怀怏怏，动辄怨望。刘参郭的十大罪，虽然全为鸡毛蒜皮之事，其中还有歪曲事实、恶意中伤的地方，但清政府无从查考，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因此，决定将郭嵩焘撤回。同时，刘锡鸿从驻英副使改任驻德正使，由于行为乖戾，无法开展正常的使馆外交工作，西方社会评论很差，因此，清政府也不能不顾忌体面，决定将刘锡鸿撤回。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正式决定将郭、刘两人同时调回。

郭、刘之争，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思想之争。郭嵩焘思想

开明，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刘锡鸿则思想保守，认为西方虽也有局部先进的地方，但中国在总体上仍比西方强。因此，他们在同样的环境里对西方社会观察了同样长的时间，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郭嵩焘认为西方的政教制度比中国先进，可以学习，刘锡鸿却认为英国的一切风俗制度都是颠而倒之，不能学习。

郭、刘之争，在实质上又涉及了近代中国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的问题：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如何把资本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侵略区别开来；如何把民族自卫同顽固守旧区别开来；如何把崇洋媚外与向西方学习区别开来。郭嵩焘、刘锡鸿是较早进入西方社会的中国官员，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都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郭嵩焘的先进之处，在于他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高于封建文明，并努力把西方的近代文明介绍到中国来，这就使他成为时代先行者。

十二、出使归来

郭嵩焘出任公使3年时间，本想努力考察西方富强的原因，将西方先进的近代文明介绍到国内，但事实与愿望的反差是如此明显，他感觉到心灰意冷，兴趣索然。他执意求退，清政府也没有挽留他，总理衙门的守旧大臣还想拿他治罪，只有少数人对他的去职表示惋惜。

当清政府决定召回驻英公使郭嵩焘时，伦敦新闻界对郭的去留也表现出非常的关心。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称赞郭嵩焘通晓欧洲事务，识见宏远，一心想把欧洲好的东西介绍给国内。继任英、法公使曾纪泽在慈禧太后召见时，也盛称郭嵩焘公忠体国，值得嘉许。他认为郭嵩焘为人正直，此次出使，不避艰难，是拚却声名为国办事。只是由于性情偏急，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所以，常常与保守的官僚士大夫意见不合，发生争论，受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他希望清政府要始终保全这样勇于任事的大臣。主持洋务大局的李鸿章对于总理衙门褫袒刘锡鸿、单撤郭嵩焘的做法也极为不满，站在郭嵩焘一边，称赞郭嵩焘在出使以后，办理外交的经验更加丰富，而且知道中外交涉的一切奥妙和程序。应当说，以上的评论，是切实、客观的，郭嵩焘受之无愧。

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怀着悒郁、孤寂的心情，告别了生活3年的欧洲，踏上了返航东归的旅程。临别前，他写了一首诗赠给新任公使曾纪泽，诗中写道：

十洲天外一帆驰，踪迹同君两崛奇。
万国梯航成创局，数篇云海赋新诗。
罪原在我功何补，北不如人老更悲。
要识国家根本计，殷勤付托怅临歧。

郭嵩焘借诗以言志。在这首诗中，他再次充满自信地肯定了自己对中外关系和中国时局的认识，虽然对自己的一生和中国的现状表现出悲观失望，但他又把希望寄托于后来者，对中国的未来仍表示了自己的信心。

1879年3月，郭嵩焘回到上海。他没有继续北上进京述职，而是奏请以病销差。英国《泰晤士报》和上海《字林报》很快报道了郭嵩焘不愿再返政坛的消息，并对郭的退隐表示惋惜。列强的这种态度无疑对清廷形成一定压力，于是一再催促郭嵩焘北上，回京任职。但郭嵩焘退志已决，清政府也就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病退请求。5月初，郭嵩焘乘轮船到达武汉。湖南乡绅听说他要继续乘轮船返乡，群起阻止。郭嵩焘不为所惧，继续上行。5月5日，到达长沙。按照当时的官场习俗，郭嵩焘身为钦差大臣，湖南巡抚及下属文武官员应热情迎接。然而，在郭嵩焘到达时，码头上冷冷清清，没有一人出来迎接这位钦差的到来，而大街小巷，却贴满了指责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揭帖。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公使，就这样背着千夫所指走出国门，又迎着国人的辱骂回归乡里。从此，他退出了晚清的政治舞台，开始了孤寂的晚年生活。虽然后来仍有洋务派官员保奏郭嵩焘，认为他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异常，是一位难得的外交人才，未可投闲置散。但是，清政府却再也没有打算让郭嵩焘走上前台来，郭嵩焘终于从晚清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纵观郭嵩焘的政治生活，他几进几出官场宦海，每次进时，他都满怀希望，信心百倍；而每次退出时，他都身心疲惫，百无聊赖。出使归来后，郭

嵩焘对清廷政治再也激不起兴趣，终于告老还乡，开始过一种山野闲人的轻松生活。但是，湖南士绅并不就此放过他。他回乡之后，守旧的士绅对他冷眼相看，并且不时制造出关于他的一些流言。他回长沙不久，总理衙门来信告知有洋人要从广西到湖南游历。士绅们风闻这一消息时，立即散布流言，说洋人是郭嵩焘勾引来的。许多学生不明真相，群情激愤，郭嵩焘被迫请求当局辟谣。风波刚过，他雇船返湘阴老家，又惹得谣言四起，说他因害怕学生闹事，要携家眷逃回乡下去。他派人到上海办事，就有人说他要去找洋人撑腰。面对守旧士绅们谣言的围剿和无知群众的误解，他关起门来，把自己有关洋务的奏议、书信、言论等编辑成一部《罪言存略》，1879年7月正式刊行。这部书既是他对自己办理洋务的实践和关于洋务的思想的一次整理和总结，同时，他又希望通过这部书来打消人们对他的误解，帮助人们认识当时中国面临的世界大局，占领一部分舆论阵地。但是，当时的湖南守旧的气氛非常浓，区区一本《罪言存略》根本无法阻挡人们的议论。谣言仍不断袭来，使他不得安宁。他与几位朋友准备建立一所“校经堂”，刚刚着手，就有人写来匿名信，指责他们以讲经史之名，行宣讲洋人的天文算学之实。他与西技和尚时相过从，士绅们就谣传他要把佛寺改建为天主教堂。甚至连他关起门做体操，也被人讥为“打洋拳”。面对如此避无可避的谣言，他只好愤愤地说：“士大夫语及洋人，则大憾，见洋人机器，所以致富强，则益憾。独于洋烟，甘心吸食。”当时湖南守旧的士绅的确如此。

守旧士绅制造的谣言、辱骂使郭嵩焘备感痛苦，但他并没有被谣言击垮。守旧士绅的险恶用心是要堵住郭嵩焘侈谈洋务的口，但郭嵩焘偏不向舆论屈服，坚持大谈特谈洋务。他向朋友声明，他之所以要讲洋务，是想使人们稍懂中外关系的奥妙，并运用它来保卫国家。如果士大夫继续虚骄自大，不去了解西方列强的情况，那么，一旦发生冲突乃至战争，衰弱的中国就可能步印度后尘。关系如此重大，做为一个先知者，能够不去启发后知者吗？这样一来，郭嵩焘虽然退出了波涛汹涌的政治漩涡，但是，山野闲人的生活却只能是一种目标，他的生活将注定是没有清静的时候的。

十三、批评时政

郭嵩焘以知洋务著名，也以知洋务自鸣得意。守旧的官僚士绅不愿去了解洋务，也反对谈洋务，郭嵩焘却说他们昏顽守旧，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处理当时中外关系的诀窍以及西方文明如何先进，中国应当从大本大源上学习西方等“洋务”，这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叛逆。

70年代后，郭嵩焘对清政府的批评不断升级。他不但批评顽固派的虚骄、守旧，而且批评洋务派的逐末舍本。他认为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是“治末而忘其本”，勉强支撑，终为徒劳。那么，怎样学习西方，才算走上正确的轨道？郭嵩焘认为：“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本”是什么？就是纲纪法度、人心风俗。它包括以议会制为主的民主政治、国家与人民利害相关的经济制度，以追求“实学”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和普及到每个人的进取精神、求实态度。他指出，西方兴修铁路、开矿产都由民间组织公司负责，政府从中赞助促成，这样，企业才能获利，国家收取的税款增多，最后达到民富国强。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不是这样，政府兴办企业作为自己的特权，不许民间办理，官吏和百姓就认为企业利益是公家之利，与自己无关，于是就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这样，近代企业虽然使西方走向富强，但在中国却只有少数人能发横财，对国计民生起不到积极的作用。他还指出，西方人认识到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就不断追求技术更新。而中国的士大夫却相信风水，迷信得很，反对机器开采，反对兴修铁路。这样的“人心风俗”怎么能使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呢？于是，他希望政府与人民同休戚，共患难，“国家有所举废，百姓皆与其议；百姓有所为利害，国家皆与赞其成而防其患。”但与此同时，他又看到，中国幅员太广，人口众多，习惯势力强大，变革不是易事。这样，他指出了清政府的政治弊病，却又开不出符合中国特点的救治药方。但这一缺憾并不能遮盖郭嵩焘思想的先进方面，他不但是洋务派中的开明思想家，而且开始认识到教育在民族进步中的作用，认识到东方和西方在传统、观念、习俗上的差异，认识到扫除某些传统观念、改变旧式的“人心风俗”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也正是他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逻辑结论，中国社会守旧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洋务派的那一点改革成果终于被其葬送，甚至连他想以畅谈洋务来唤醒虚骄自大、一味排外的士大夫也不可得。而在出使期间，他又耳闻目睹了西方社会的真实情况，看到了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改变传统习俗、树立新风尚中的作用。

清政府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封建政权，维持几千年不变的封建习俗正是它得以存在的理由，因而，它不可能去倡导改变人心风俗。即使是洋务派进行的一些细枝末节的改革，也遭到守旧派的一再反对，那么，要彻底改变这种因循守旧的社会习俗、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就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郭嵩焘曾经预料，“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虽然郭嵩焘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圣人”的观点的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但他对中国的“人心风俗”的不易改变、根深蒂固的认识却是非常深刻的。直到百余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国家，扫除封建残余仍是一项不可轻视的任务。

十四、禁烟公社

郭嵩焘在认识到人心风俗的改变非常困难之后，没有后退，没有消沉，而是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倡导废旧习、树新风，他在晚年倡导成立的禁烟公社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这正是郭嵩焘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闪光点。

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恶性肿瘤，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害。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就是中国人民进行的禁绝鸦片的正义斗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战争失败了。此后，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威胁下，鸦片在中国逐渐从不合法向半合法、合法转化。但清醒之士始终都在呼吁清政府禁绝烟毒以正风俗，郭嵩焘就是对禁止鸦片一向关心的一位。

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曾看到这样一幅情景：英人阿什伯里在中国游历时，拍下了不少中国百姓吸食鸦片、男女僵卧的照片，西方人在看到这些照片后，拿来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这大大刺伤了郭嵩焘的自尊心，于是在1877年3月22日上奏清政府，要求严厉查禁鸦片。他提出查禁鸦片要从教育入手，从培养士大夫的廉耻心做起。为此，他又提出以3年为期，逾期不能戒者，官吏革职，生员、举人取缔所得称号，官员知情不报者同罪。同时他要求清政府制止四川、云南、甘肃、陕西等省广种罂粟的趋势，对禁烟不力的督抚大员要严加处分。然而，当时鸦片税已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禁烟已不可行，不禁又败坏社会风气，于是清政府对郭嵩焘的奏折没有明确表态，而是寄给各省督抚，命令他们“斟酌情形，妥筹具奏”。结果自然令人失望，各省的答复只有隔靴搔痒的寥寥数语。这年7年月，郭嵩焘不甘失败，再次奏请禁止鸦片。他在奏折提出了禁止栽种、查封烟馆、明定章程等具体办法，并要求清政府“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逐渐禁绝烟毒。对于郭嵩焘的强烈的呼吁，清政府置若罔闻，不为所动。李鸿章甚至认为郭嵩焘的建议脱离实际，根本不可能实行。两广总督刘坤一也认为郭嵩焘的建议万不可行。他的理由之一是广东海关每年的鸦片税有百万之多，一旦禁烟，这项亏空从何弥补？

1878年，郭嵩焘从英国人写的中国游记中了解到四川、云南等省种植鸦片的详情，不胜惊骇。书中记载，两省三分之一的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不久，英国报刊又披露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吸食鸦片的情况，“四川人吸食鸦片者无处无之，至贵州而吸食者愈众，至云南而极。”郭嵩焘看后，心潮起伏，寝食不安，但两次上奏都无结果，他只有仰天长叹，而对清政府能否解决鸦片问题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出使归来后，郭嵩焘辞官归里，没有公务缠身，于是就有时间和精力来切实实行禁止鸦片一事了。1879年9月，他与朋友筹备组织禁烟公社。公社的宗旨是，既然政府已不能禁止鸦片，于是就和主张禁烟的一二同志一起亲自发起禁烟倡议，进而在一乡一族中逐渐实行，以达到有志者闻风兴起、扩展开来的目的。10月15日，禁烟公社正式成立，参加者有当地士绅多人。公社成立后，郭嵩焘首先从郭氏家族做起，查出吸烟者25人，其中既有老人，也有中青年，他送给吸烟者一人一本《戒烟条规》和一封戒烟的丸药。据禁烟公社的调查，长沙有3000家烟馆，这个数字之大，终于惊动了湖南巡抚，他表示支持禁烟公社的行动，并下令查禁烟馆。到1880年春，禁烟公社又增加了5名社员，他们每季度开会一次，再次集会时，郭嵩焘都要反复宣讲鸦片流毒中国的危害，号召人们洁身自好，不要沾染恶习，已有烟瘾的要坚决

戒除。公社同人也常常上台宣讲，并呼吁政府明令戒烟。

郭嵩焘的这种禁烟实践只限于一个小范围，对于地广民众的中国而言，这种小范围的禁烟自然不足以产生强大的反响，但同时又不可低估它的影响，至少对当地的社会风俗还是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禁烟公社的社员又只在禁烟这一点上志同道合，至于其他社会观念则千差万别，因此，聚会时，人们谈论的内容就远远超出了禁烟的范围。这等于为人们开辟了一个自由谈论的园地，各种思想竞相在这里传播，这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接受新鲜事物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十五、不甘寂寞的晚年

80年代后，郭嵩焘告别了政治舞台，自己也打算过一种山野闲人的清静生活，然而，他的心却无法平静下来，仍时刻关注着外面的世界，关注着国家的大事。

1882年，中法关系紧张，消息传至湖南，郭嵩焘非常关注。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内部明显地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李鸿章是主和派的重要人物，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没有取胜的把握，而“一朝决裂，全局动摇”，因此，主张妥协求和。主战派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曾纪泽等少数几个真正了解中法情况和战局的少数有识之士，又有态度激昂、纸上谈兵、不了解中外情况的清流派。郭嵩焘一向反对与洋人开仗，因此，自然成为李鸿章的积极支持者，不断发表主和言论。1882年8月，郭嵩焘就上奏清政府，主张开放云南，与法人通商。1883年6月，郭嵩焘致函李鸿章，主张调停中法越南关系，反对动用武力。1884年春，法国侵略军已向越南北部进攻，驻越清军败退，中法战争已经打起来，而郭嵩焘仍然反对战争。在他看来，西方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实力强大，中国因为长期封闭落后，因此无力与西方抗衡。同时，他又指出，西方侵略的目的在于追求高额利润，并不是热衷占领土地，因此，如果中国主动通商，就不会引起大的冲突，否则，就可能走向战争，结果可能更糟糕。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人主战都是无知，都将误国。他主张，在中国落后的现状下，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主动开埠通商，学习西方的一切长处，争取变被动为主动。平心而论，郭嵩焘从中外大局上着眼，反对一切战争，主张以妥协求和平，在战略上是对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而且走向了极端，因而，在认识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譬如，他不顾具体情况，反对一切战争；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的认识也不全面；将敌强我弱的形势绝对化，并把西方列强挑起的侵略战争的责任推给被侵略的一方等，这都是严重的错误。他的这种脱离实际的空论，不但遭到主战派的反对，甚至连主和派的李鸿章也认为迂腐，对他的许多建议都不予理睬。

1888年至1889年，洋务派和顽固派在兴修铁路的问题上又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兴修铁路之争，早在1884年就开始了。此后争论一直不断。每次争论，顽固派的阵容都很强大，他们总是要找出种种理由来反对修路，而洋务派则总想冲破阻力，以时代大势立论，希望兴修铁路。1888年，为方便运煤，李鸿章奏请兴修天津至通州的津通铁路，顽固派闻之哗然，群起反对。清政府被迫收回成命，并谕令各省官员开展铁路问题的讨论。

郭嵩焘是最早主张修建铁路的人之一。这次津通铁路之争传到湖南，他也不甘寂寞，再次发表自己的意见。1889年8月，郭嵩焘致书李鸿章，积极支持李鸿章兴修津通铁路的建议。同年，他又撰成《铁路议》和《铁路后议》两文，阐述自己在这问题上的主张。他认为，兴修铁路应该循序渐进，不能盲目仿效西方广修铁路。其理由是：一、西方兴修铁路由民间集资，国与民利益与共，因而能够实现长远目标，达到民富国强。而中国兴修铁路，费用由国家承担，官员则从中渔利，损公肥私，因而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的。二、中国官与民矛盾突出，互为仇敌，铁路即使修起来，也会不断遭到人民的破坏，因而，广修铁路的结果恐怕是费力不讨好。郭嵩焘在这问题上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主张修路，但又反对盲目行动。这里面，也反映了郭

嵩焘思想中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他认识到中国要学西方，才有出路，但又认为清政府不可能学好；他已然认识到清政府无可救药，但又找不到治病救国的良方。这个问题，已不是郭嵩焘能够回答的了，要等继起的后来者去寻找答案。

1889年，郭嵩焘经常患病卧床，健康大不如前。到1891年，他抱病写完《玉池老人自叙》时，已觉难支。在《玉池老人自叙》的扉页上，他写了一首小诗，诗为：

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他在诗中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概括，并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后人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溘然长逝。8月2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历数郭嵩焘劝曾国藩出山、建议湘军创办水师、倡办厘金、出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出使英、法大臣等“军功”、“政绩”，为其请谥立传。8月29日，清政府降下一道声色俱厉的谕旨，驳回了李鸿章的请求，谕旨称：“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郭嵩焘批评过顽固派、清政府，其思想也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封建官僚，与封建正统有越来越深的思想裂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郭嵩焘的主要言行是为维护国家的利益，然而，统治者到他死也没有原谅他。

郭嵩焘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一生都在倡导新思想，与守旧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的思想深处充满着爱国忧民的感情，即使为此屡遭打击，也从不后悔。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统治者不可能接受他，而在他死后，历史却终于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是郭嵩焘生前就预料到的，也是他在天之灵应得的一丝安慰。

